

从《致乔治·桑》看勃朗宁夫人的诗歌追求

袁 欣

《致乔治·桑》反映了勃朗宁夫人对 19 世纪女性诗人艰难处境的思考, 以及她的诗歌追求: 女性诗人应突破性别的藩篱, 将自己提升到自由不羁的境界; 开创一个才情与风骨交融的新的女性诗歌传统, 以拓展女性诗歌的领域。这既是勃朗宁夫人对乔治·桑的期许, 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诗人的心声。

勃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和乔治·桑(George Sand) 是19世纪前半叶欧洲著名的女作家, 一位生活在英国, 一位生活在法国。当乔治·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遭到非议和诽谤时, 勃朗宁夫人却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她的理解、同情和仰慕。勃朗宁夫人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称她为“女才子”, 又说她的作品为自己苍白的生活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还将她跟雨果、巴尔扎克并列, 说在所有法国作家中, 自己最钦佩的就是他们三位。

勃朗宁夫人对乔治·桑的这种态度集中地表现在两首十四行诗《致乔治·桑》中。如果仅从艺术角度衡量的话, 这两首诗或许并非上乘之作。帕特丽夏·汤姆森(Patricia Thomson) 的评价是“笨拙、纷乱、不流畅”。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 也认为它们尽管非常“真诚”但“不够灵活”。也许是由于这种原因, 文学史家对这两首诗缺乏足够的重视和专门的研究。然而在笔者看来, 这两首诗无论在勃朗宁夫人个人的创作生涯中, 还是在欧洲女性诗歌的谱系中,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值得我们重视。

笔者谨将这两首诗翻译如下:

Frederic C. Kenyon (ed.), *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New York: Macmillan, 1897, I: p. 363.
Patricia Thomson, *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p. 46-47.
Elaine Showalter,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2.

其一 心愿

你是头脑广博的女人, 又是爱心广博的男人,
自称乔治·桑! 你的灵魂, 被囚在如狮子般
躁动不安的感官中, 发出反抗的悲鸣
以怒吼回敬怒吼, 唯心灵之所能:
我愿一阵轻微而神奇的雷声
奔过掌声四起的斗兽场的上空,
以你高贵天性中的力量和才识,
从你坚强的臂膀上, 长出双翼,
洁白如天鹅, 使全场震惊
你那圣洁的光芒! 兼有女人和男人的特质
与天使齐飞, 同沐圣恩
真正的天才, 远离责难、受人景仰,
直到孩子和少女扑入你的怀中,
在你的唇边铃下无瑕的声名。

其二 识别

真正的天才啊, 但是真正的女人! 你是否
以男子汉的轻蔑否认你那女子的天性,
并放弃俗不可耐的小玩意儿、小饰物
那都是被禁锢的弱女子才佩戴的?
啊, 多么徒劳的否认! 那反抗的呼喊
变成内心的啜泣, 只因你那女性的声音无人理会, ——
而你那女人的长发, 我的姐妹, 未经修剪
带着痛苦的力量, 凌乱地向后飘散着
证明你男性的名字是假的: 在世人面前
以诗人之火燃烧着自己,
我们始终看到一颗女性的心在跳动
在熊熊火焰中。跳得更纯一些吧, 心呀, 跳得更高一些,
直到上帝取消你的性别差异, 在天堂的彼岸
那是无羁绊的灵魂倾心向往的地方!

《致乔治·桑》选自勃朗宁夫人1844年出版的《诗集》, 赞扬了乔治·桑的奋斗精神与抗争意识。在第一首诗中, 勃朗宁夫人看到了乔治·桑的灵魂与肉体在进行殊死搏斗, 希望上天显灵, 使乔治·桑的灵魂得以摆脱肉体的束缚。在第二首诗中, 诗人看穿了乔治·桑“男子汉”的伪装, 识别出其女性的身份, 以及她把痛苦转化为力量, 拿起笔来为理想和自由而战的勇气。

勃朗宁夫人在写这两首诗的时候还未见过乔治·桑, 只读过她的作品, 却已深深地为她那青春的热情与反抗的意志所折服。

在维多利亚时代, 女作家写诗献给自己景仰的另一位女作家, 是一种很普遍的文学现象。

原诗中的“kiss”, 是亲吻的意思。但细细揣摩诗人的用意, 带有印下了某种痕迹之意, 在翻译成中文时, 我用了“铃下”这个词, 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印章所留下的痕迹, 或可得其神似。因为乔治·桑声名不佳, 所以诗人特地用了“stainless”(无瑕)这个词, 其中带着强烈的同情和期望。

Cf. Angela Leighton & Margaret Reynolds (eds), *Victorian Women Poets: an Anth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5.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作家的创作道路比男性作家更为坎坷,于是自发地形成一种彼此扶持、相互鼓励的关系。女作家之间的相互题献便是常用的方式,仿佛她们之间展开了某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并成为彼此灵感的源泉。勃朗宁夫人向乔治·桑献诗,便是她积极参与这种文学活动的证明。她借着《致乔治·桑》这样看似私人之间题献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对诗歌的追求,则又超越了上述一般女性诗人的文学活动,而使之具有更深的含义。

乔治·桑原名奥罗尔·迪潘(Aurore Dupin),十八岁嫁给一位男爵,但她不能容忍丈夫的平庸和鄙俗,做出了那个时代惊世骇俗的举动:坚决与丈夫分居,带着一儿一女定居巴黎,开始了藐视传统、特立独行的自由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一身男性装束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的追随者之间,其中包括诗人缪塞和作曲家肖邦。她更以乔治·桑这个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凭自己的天分与勤奋,在男性作家垄断的文坛争得一席之地。

在19世纪的欧洲,“女权”尚未被社会认可,女性追求事业的雄心壮志很难被世人理解。人们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是娇柔脆弱的,最好动不动就晕倒,可以让男士们表现英雄救美的骑士精神;女子不需要读很多书,“为的是要有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也不需要很聪明,这样才能显出男士们见多识广;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女子应是家中的天使,给男士们提供家庭的温暖和心灵的慰藉。何谓“家中的天使”,伍尔夫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明确指出:“她怀有深厚的同情心。她具有非凡的魅力。她百分之百的无私。她擅长一切家庭生活的艰难艺术。她牺牲自我……她从不曾有过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是:一个有头脑的、自由不羁的、充满活力的男人是伟大的,但这样的女人则是堕落的。波德莱尔对乔治·桑的攻击最为恶毒,他讽刺乔治·桑想做男人,并且说“女人想做男人是大败坏的征兆”。在《给文学青年的忠告》中,波德莱尔把“女才子”列为“对文人有危险的一类”,认为“女才子”不安分,“想做男人而不得”。就连勃朗宁夫人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不齿乔治·桑的思想和言行,例如,亨利·乔利(Henry Chorley)就告诫勃朗宁夫人不要公开称赞违背传统的乔治·桑,否则会影响她自己的文学声誉。

二

这两首十四行诗不仅抒发了勃朗宁夫人对乔治·桑的赞赏和崇拜,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对女性诗人普遍的期许,或者说她通过对乔治·桑的赞美为女性诗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精神坐标,进而传达出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诗人的心声。这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勃朗宁夫人认为女性诗人应突破性别的藩篱,将自己提升到自由不羁的境界。

在《心愿》一诗中,诗人笔下的乔治·桑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于一身,既有男性的才智也有女性的柔情。勃朗宁夫人称乔治·桑既是“头脑广博的女人,又是爱心广博的男人”。根据19世纪的传统观念,男女之间壁垒分明,“头脑”(brain)一词通常和男子相联系,而“爱心”(heart)一词通常和女子相联系。例如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写道:“男人征战沙场,女人守着炉膛:/男人挥剑,女人引线:/男人有头脑(brain),女人有爱心(heart):/男人下令,女人听命。”而勃朗宁夫人却一反常情,一开头就称赞乔治·桑为有头脑的女人和有爱心的男人,这两句诗遂成为全篇之

奥罗尔·迪潘以乔治·桑这个男性的笔名发表作品,是因为《巴黎评论》的编辑看不起女人。19世纪的读者、评论家对女作家极为苛刻,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和不必要的麻烦,不少英国女作家步乔治·桑的后尘,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如勃朗特姐妹和玛丽·安·埃文斯(即乔治·艾略特)。

《乔治·桑自传》,王聿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Virginia Woolf, "Professions for Women", in *The Death of the Mot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2, p. 237.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

Meredith B. Raymond & Mary Rose Sullivan (eds), *Women of Letters: Selected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and Mary Russell Mitfor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p. 141.

Alfred Tennyson, *The Princess: a Medley*, New York: D. Appleton & Co., 1902, Part V, Lines 437-440.

警策,震撼人心。诗人特别用了同一个形容词“博大”(large)来修饰代表男性的“头脑”(large-brained)和代表女性的“爱心”(large-hearted),将男女之间的界限打通了,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勃朗宁夫人坚信真正的天才与性别无关。勃朗宁夫人希望自己在人们心中是一位诗人,而不要被强调是“女诗人”。她曾对朋友说,当她谈到妇女的时候:“并不是基于某种单独的特有的女性的标准,而是人性共通的标准。”令她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在提到勃朗宁夫人的时候,总称她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诗人。1850年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去世,让勃朗宁夫人荣膺这个称号的呼声很高,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国王乃是女性(维多利亚女王),所以应把这份殊荣授予一位女诗人。而在勃朗宁夫人看来,女王的桂冠诗人应当是女性,这种看法实在荒谬,作家的伟大与否应该以其作品的质量来衡量,而不是以性别来衡量。真正的天才应该身兼男性和女性的长处,就像她眼中的乔治·桑一样。八十五年之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只有当男女两种因素在心灵中和谐融合,才会产生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伍尔夫心目中的伟大作家都具有双性心灵(androgynous mind),如莎士比亚、济慈和柯勒律治。

《识别》一诗的末尾几行最耐人寻味,诗人笔下的“熊熊火焰”与东方凤凰涅槃的观念十分类似,认为女性诗人只有经历痛苦和挣扎才会写出纯粹的诗歌。诗人希望乔治·桑坚持下去,期待她的心跳得更纯更高,直到天国——一个没有性别区分的地方。而所谓“天堂的彼岸”不仅仅是狭义的宗教上的概念,还象征着文学艺术的最高殿堂。这不只是对乔治·桑的激励,也是对所有女性作家包括诗人自己的激励,因为真正的天才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这首诗的副标题“Recognition”,含义丰富,既可以表示“识别”也可以表示“赏识”或“认同”,“识别”的是在男性装扮掩饰下乔治·桑女性的心,“认同”的是乔治·桑的激情与抗争。

在勃朗宁夫人的《识别》里出现了她惯用的“燃烧”(burn)一词,同时还用了“火”和“火焰”的意象。勃朗宁夫人笔下的“燃烧”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世俗之火的燃烧,世俗的偏见、世人的诋毁像火一样灼烧着诗人;另一层含义是诗人激情之火的燃烧,它可以将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和痛苦转化为与世俗抗争的力量。女性诗人只有把全部生命和灵魂融入诗歌创作中去,经过世俗之火与内心之火的双重燃烧,才能如凤凰涅槃一样,浴火重生,成为真正的诗人,写出不朽的诗篇。1852年,勃朗宁夫人终于在巴黎见到仰慕已久的乔治·桑。从诗人写给友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桑并没有让诗人失望,“绝没有半点卖弄风情……我喜欢她……文静中你会感到她的整个灵魂在燃烧”。灵魂的燃烧是痛苦的,但只有经过痛苦的磨炼,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勃朗宁夫人在她的另一首诗《乐器》(A Musical Instrument)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此诗写一根芦苇经过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潘(Pan)的采摘、修剪,乃至心都被掏空了,终于被制成一根笛子,芦苇所经受的种种痛苦终于转化为甜蜜的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致乔治·桑》这两首诗的后半部分都有描写飞腾的诗句,象征着女性诗人的自我提升。在《心愿》中,诗人希望乔治·桑“长出双翼,洁白如天鹅……与天使齐飞”,“翼”使人联想到“羽毛”(quill),一个和作家这种职业紧密联系的意象。因为19世纪以前,人们写作时使用的笔是以鹅的羽毛制成的,即鹅毛笔(goose quill);而笔(pen)在拉丁文里是“penna”,就是羽毛(feather)的意思。在《识别》中,同样地,诗人希望乔治·桑那颗诗人之心跳得“更纯一些”、“更高一些”,登上那“天堂的彼岸”,也就是没有“羁绊”的地方!

其次,勃朗宁夫人开创一个才情与风骨交融的新的女性诗歌传统,从而大大地拓展女性诗歌的领域。常人津津乐道的只是乔治·桑的奇装异服和绯闻趣事,而勃朗宁夫人看到的却是她不屈的灵魂:“你的灵魂,被囚在如狮子般/躁动不安的感官中,发出反抗的悲鸣/以怒吼回敬怒吼,唯心灵之

Cf. Alethea Hayter,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5, p. 5.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3-108.
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II: pp. 56-57.
在希腊神话中,潘的形状为半人半羊,是司大地、山林和牧羊人之神,发明了牧羊笛 Panpipe。

所能”(《心愿》)。诗人笔下的乔治·桑,“灵魂”被困在代表肉体的“感官”之中,进行殊死的搏斗。诗人用“狮子”加以形容,暗示这种“感官”具有凶猛的力量,不可抗拒,也不可改变。“狮子”的意象和下文中提到的“掌声四起的斗兽场”前后呼应,使得乔治·桑的“灵魂”化作了角斗士。诗人把殊死搏斗的场地设在古罗马竞技场,别有深意,我们不仅看到乔治·桑的灵魂与肉体搏斗时的惨烈和悲壮,而且联想到观众(读者)的冷酷——他们悠闲地欣赏着乔治·桑灵魂的痛苦和挣扎,并以此取乐解闷,最终,疯狂地叫嚣着:“杀死她!杀死她!”在《识别》中,诗人同样表达了基督教灵肉之争的观念,希望乔治·桑的心跳得更纯更高,直到天国。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的肉体(感官)是不纯洁的,灵魂(心灵)摆脱了肉体的束缚,升入崇高的天国才可以达到“纯”的境地。所以勃朗宁夫人将“纯”和“高”联系起来,诗中所包含的上述这层不易察觉的深意,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诗发表后不久就被译成法文,乔治·桑的读后感是:“我现在的年龄已不大能听到狮群在我体内的怒吼了,而且我也不记得它们曾经发出过那么惊天动地的怒吼。”过了叛逆年龄的乔治·桑似乎觉得诗中的形象并不大像她本人。这说明勃朗宁夫人笔下的乔治·桑并不完全是真实生活中的乔治·桑,而是诗人的精神寄托,诗人通过对乔治·桑充满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的刻画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勃朗宁夫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希望未来的天国能改变人间的种种不平与缺憾。她在《心愿》一诗中真诚希望奇迹出现,不仅让灵魂插翅飞出肉体的禁锢,也超越世俗的二元对立(男与女、灵与肉的对立)的观念。在勃朗宁夫人的心目中,“孩子和少女”是最纯洁无瑕的,诗人由衷地希望她们亲吻诗人,除去世人加之于她的一切恶名。在《识别》中,诗人的思考更加深刻了。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乔治·桑依然桀骜不驯,她不甘心作男人的附属品,以“男子汉的轻蔑否认”其“女子的天性”,不屑佩戴弱女子的小玩意儿。诗人用“小玩意儿”和“小饰物”(gauds and armlets)作为女性的象征,不仅准确而且发人深思,让人产生女性乃是男性之玩物与装饰的联想。又如那“无人理会”的女性的声音,由“反抗的呼喊”(revolted cry)变为“啜泣”(sobbed),对比鲜明。最令人震撼的意象是乔治·桑的长发,在诗人眼中,乔治·桑仍然是“被禁锢的”女性,在痛苦中挣扎,而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把这种痛苦转化为力量,拿起笔来为理想和自由而战。

乔治·桑的人生及其作品为勃朗宁夫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原型。诗人笔下的乔治·桑有着不屈的灵魂和燃烧的诗情。诗人曾感叹道:在英国的诗歌传统中,她曾四处寻觅自己“诗歌的祖母”,但一无所获。诗人的意思其实是说,她无法找到一个女性的诗歌传统可以供她继承,并从中汲取养料。令勃朗宁夫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女性诗歌传统过于局限,仿佛女性诗人惟一的優勢就是感受悲伤的能力强些。L. E. L. (Letitia Landon),一位勃朗宁夫人很尊敬的稍长于她的女诗人,在《闪亮的紫罗兰》这首诗中写道:“我的力量是纯女性的,/来自温柔和悲伤”。而勃朗宁夫人认为这样有些病态,应该把痛苦和悲伤转化成勇气和力量。正是这份勇气和力量使得她自己的诗歌“忧郁但不病态”。正是在乔治·桑那里,她看到了女诗人身上少有的不让须眉的魄力,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偶像。

在写作题材上,当时的女作家受到苛刻的限制。乔治·桑的作品因常常涉及所谓不雅的话题而遭人诟病,这也是世人加之于她的最主要的恶名,认为她毒害了少女们纯洁的心灵,勃朗宁夫人的好朋友米特福德小姐(Mary Russell Mitford)就认为她的作品像蛇的毒液一样侵蚀人的灵魂。勃朗宁夫人在诗中希望奇迹出现,使乔治·桑最终“远离责难,受人景仰”(《心愿》),这也间接地反映出诗人对所有女作家创作环境的忧虑:稍有不慎,便会引来闲言碎语,甚至是恶毒的

Margaret Amorlier, "The Hero and the Sage: Elizabeth Barrett's Sonnets 'To George Sand' in Victorian Context", *Victorian Poetry*, Vol. 41, No. 3, (Fall 2003), p. 319.

The Letters of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I: p. 232.

David G. Riede, *Allegories of One's Own Mind: melancholy in Victorian poetry*,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1.

Patricia Thomson, *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 p. 45.

攻击和谩骂。在写了《致乔治·桑》一年之后,勃朗宁夫人开始构思她的代表作《奥罗拉·莉》(Aurora Leigh),因为其中也涉及“性”、“卖淫”,甚至“强暴”等诸多“不雅的话题”,诗人不得不担心这部作品的命运。但诗人并未因此而裹足不前,她认为解决问题的态度应是直截了当地面对它们,而不是假装它们并不存在。她在致日后成为她丈夫的勃朗宁的信中表明,“目前,我的主要意图是写一种诗体小说……冲破惯例、习俗,闯入……‘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于是,没有假面掩盖,面对面跟时代的人性相见,把人性的真实明明白白讲出来。”在《奥罗拉·莉》中,诗人真诚地呼吁:“至少我们已做出了高尚的努力,/请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尽管我们是女人,/如果不能给我们戴上赞美的荣冠,请用真诚。”

在选择诗歌题材这个问题上,勃朗宁夫人还有更广泛的思考。关于诗歌是否应该反映当代的题材,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各持己见。勃朗宁夫人既不同意阿诺德提出的,诗人应该回到古典时代去找灵感;也不像丁尼生那样回避现实,在诗篇中借用中世纪亚瑟王朝的传说以古喻今。在《奥罗拉·莉》中,勃朗宁夫人表示:“用骑士的白骨堆成的诗句,/必然全无生命,/这也不足为奇:继承死亡的只有死亡。/不仅如此,如果在这过于拥挤的世界上/还有诗人的立足之地(我想是有的),/他们惟一的工作就是代表这个时代,/自己的时代,而不是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放弃现代的装饰、外衣或衣裙的荷叶边,/去追求古罗马时的长袍和别致的东西,/这是致命的,也是愚蠢的。”勃朗宁夫人以她的《奥罗拉·莉》等诗歌充分地证明,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同样蕴藏着诗的题材。

《致乔治·桑》的格律采用彼特拉克式(Petrarchan sonnet),韵脚的排列是:abba abba cdcd-cd——四个韵回旋反复。传统的彼特拉克式即意大利式,意思随韵式分为两层:前八行一层,后六行一层;后六行往往是对前八行的拓展或否定。而《致乔治·桑》却不同于传统,其意思是按照前四、后十划分的。《心愿》用四行写乔治·桑灵魂与肉体的搏斗,用十行写诗人对乔治·桑的期许,这就加重了期许的分量;《识别》前四行写乔治·桑对女性身份的不屑,后十行写诗人的识别和期望,同样加重了期许的分量。

为什么勃朗宁夫人要着重表达自己对乔治·桑的期许呢,乃是出于对现实的她有所保留。尘世中的乔治·桑并不是勃朗宁夫人心目中的理想诗人。这也反映了诗人对乔治·桑的矛盾心理:在自强不息的精神方面,诗人崇拜乔治·桑,但在道德层面,诗人又多持保留态度。勃朗宁夫人总的说来是赞赏和仰慕乔治·桑的,称赞她是非凡的天才,另一方面又说她是“堕落的天使”,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所以勃朗宁夫人在这两首诗里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表达对她的期望,希望她提升自己的品德,飞上天国。这种双重的态度,使得诗的主题更加深刻了。

一年之后,勃朗宁夫人开始创作诗体小说《奥罗拉·莉》,诗中塑造了一位真正理想的女诗人,有着乔治·桑的才气与独立,也有乔治·桑欠缺的无瑕的品德。女主人公的名字奥罗拉,正是勃朗宁夫人按乔治·桑的本名来命名的。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曾指出:“《奥罗拉·莉》并不是取材于桑的某部单一的小说;而是桑的全部作品、桑的人生观和修正了的桑的生活方式,使得勃朗宁夫人塑造了自己诗歌的女主人公。”可以说,勃朗宁夫人通过塑造奥罗拉·莉这个形象为女性诗人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和传统。

The Letters of Robert Browning and Elizabeth Barrett, 1845-46, I: p. 32.

《勃朗宁夫人诗选》,袁芳远等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第208—209页。

关于“前四后十”之分乃得益于山西大学张耀平先生的指教。

David G Riede, Allegories of One's Own Mind: Melancholy in Victorian Poetry, p. 120.

Betty Miller (ed.), Elizabeth Barrett to Miss Mitford, 1954, p. 145.

Cora Kaplan, "Introduction",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Aurora Leigh and Other Poems, London: Women's Press, 1978. p. 23.

海伦·库珀(Helen Cooper)认为勃朗宁夫人从小在父亲那儿(父亲的书房和丰富的藏书)学到了知识,从母亲那儿学到了爱。在母亲的影响下,勃朗宁夫人很早就意识到女性之间的爱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像乳汁一样滋养彼此的心灵。这种女性之间的友爱贯穿在《致乔治·桑》以及《奥罗拉·莉》中。

三

勃朗宁夫人之所以尊敬乔治·桑,是由于二人在心灵上的契合。勃朗宁夫人十五岁那年不慎坠马,损伤脊柱,从此失去了健康和自由自在的生活,长期困守闺房,又受到父亲的虐待式的疼爱。她长期感受着身体对心灵的束缚,因而乔治·桑的搏斗在诗人心里得到共鸣。正如帕特丽夏·汤姆森在《乔治·桑与维多利亚时代文人》一书中所说:“二者都很热情、冲动、感情充沛;二者均为浪漫派,年轻的时候是拜伦的崇拜者,激进分子,温和的女权主义者;二者均有非凡的创造力,是热情洋溢的改革者;而且对二者而言,文学创作都是第一位的。乔治·桑自称是一位诗人而非改革者,伊丽莎白·巴雷特(即勃朗宁夫人)也把诗歌看作是自己最纯粹最崇高的职业。最为重要的是,她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雄心壮志。”

实际上勃朗宁夫人在当时的地位以及对后代的影响都不亚于乔治·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勃朗宁夫人把比自己年长两岁的乔治·桑视为文学偶像,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大都把勃朗宁夫人视为楷模,是她们尊敬的、努力效仿的、甚至力图超越的对象。很多著名的女诗人都写诗献给勃朗宁夫人,包括多拉·格林威尔(Dora Greenwell),贝茜·帕克斯(Bessie Rayner Parkes)和黛娜·玛丽亚·克雷克(Dinah Crak)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称勃朗宁夫人为“伟大的女诗人”,承认自己的十四行组诗《无名的莫娜》(Monna Innominata)是受了勃朗宁夫人《葡萄牙十四行诗集》的影响。罗塞蒂甚至打算接受出版社的邀请,为勃朗宁夫人写一篇传记,但当她得知罗伯特·勃朗宁反对任何人为太太作传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所有女诗人中,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要算是最崇拜勃朗宁夫人的了。对狄金森而言,勃朗宁夫人是最杰出的女诗人,她曾把勃朗宁夫人视为衡量其他诗人的标准。她有三幅勃朗宁夫人的画像,其中一幅挂在自己的床头。勃朗宁夫人去世后,狄金森还为她写了著名的悼诗《她的最后的诗集》。在诗歌的形式和风格方面,狄金森并没有直接模仿勃朗宁夫人,她接受勃朗宁夫人的影响主要在精神层面,勃朗宁夫人向她展示了女性同样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勃朗宁夫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诗坛,即便是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也高度称赞勃朗宁夫人所取得的成就,她认为其最伟大的作品《奥萝拉·莉》以充分的自信“展示了女性所有独特的力量”,“勃朗宁夫人或许是第一位能做到这一点的女性作家”。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的文坛天才辈出,群星璀璨,文质炳焕,如狄更斯、萨克雷、哈代、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丁尼生、勃朗宁夫人等等,不胜枚举。勃朗宁夫人在他们中间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以其独特的成就,以及建立女性诗歌传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她呼吁诗人关注现实,取材于现实,鞭挞现实中不合理的现象,并引领人们冲破诸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世俗的羁绊,走向光明的未来。从这样广泛的背景上审视《致乔治·桑》,我们便会更清楚地感受到它那带有先驱性的意义,它预示着19世纪女性的觉醒,以及女性诗人建立自己诗歌传统的要求。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英语系、北京语言大学英语教育中心)

责任编辑 宋蒙

Patricia Thomson, *George Sand and the Victorians*, p.46.

Constance W. Hassett, *Christina Rossetti: The Patience of Styl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p.71.

Cf. Helen Cooper, "Mrs Browning and Miss Evans",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 35, No. 3, Special Issue: George Eliot, 1880-1980 (Dec., 1980), p. 257.

勃朗宁夫人支持废奴运动,1850年出版长诗《逃奴》;她还支持意大利的解放事业,1851年出版《吉第居窗前所见》。